

国务学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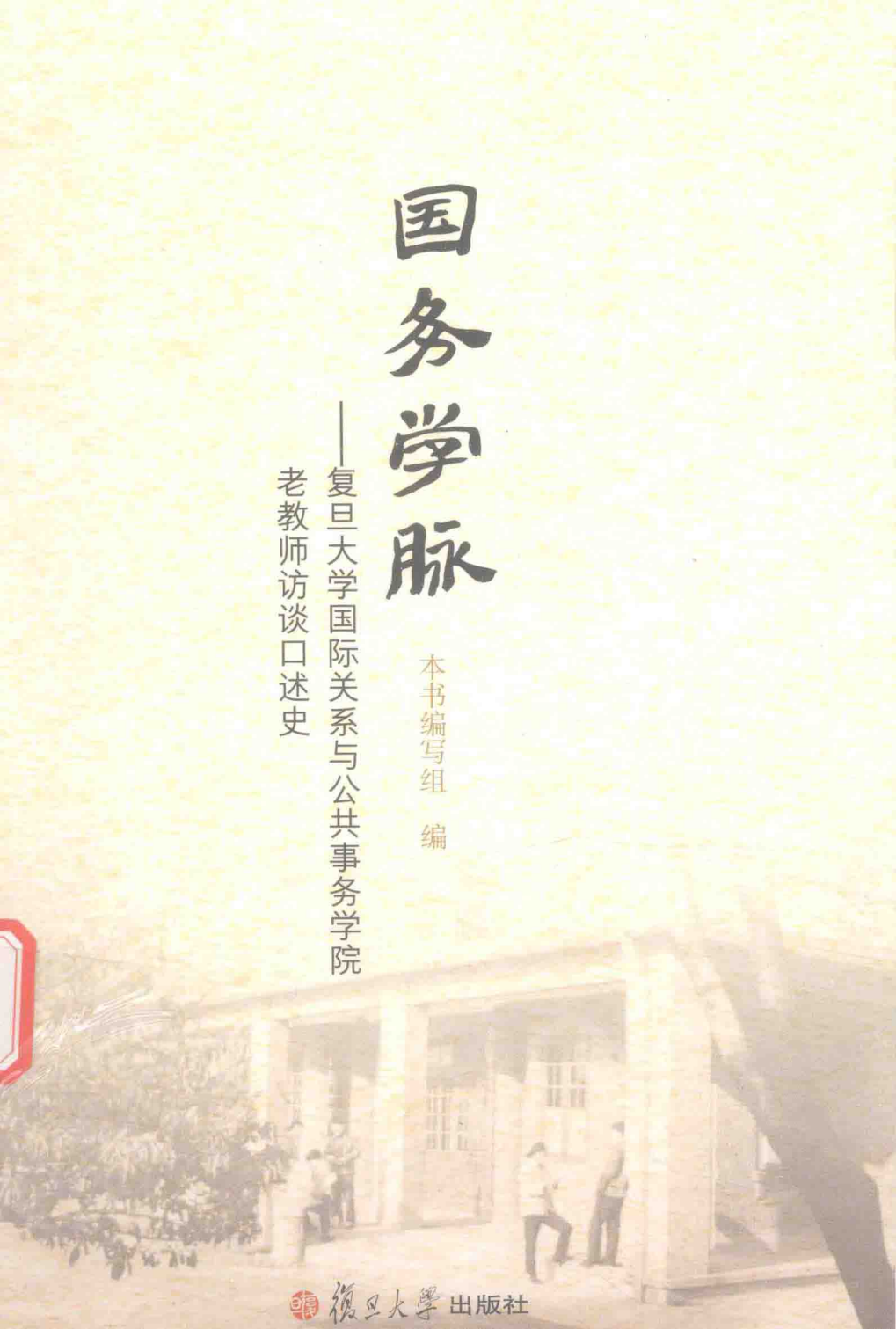
本书编写组 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老教师访谈口述史



复旦大学

出版社



国 务 学 脉

本书编写组
编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老教师访谈口述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务学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老教师访谈口述史/本书编写组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309-11692-2

I. 国… II. 本… III.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校史 IV. G64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3736 号

国务学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老教师访谈口述史
本书编写组 编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02 千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692-2/G·1498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PREFACE

国务学脉，真水无香

刘季平

这是一本小书，也是一本大书。

说其小，一是从口述史的专业水准来说，访谈技巧、文字整理和考证能力都尚显稚嫩。访谈和后期编辑的主体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生，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 90 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项目。二是从内容上看，本书从学院老教师的口述访谈入手，由个人经历而反映出我们这个集体。由于老师们的严谨和理性，50 余万字的录音材料整理，仅修订出 20 余万字入书；文字风格也较为平淡，读来颇有几分“真水无香”的意蕴。火热年代、奋斗青春、岁月沧桑，都在字里行间化作了安静与回忆。

说其大，是因为水滴折射太阳的光辉。本院的老教师面对后学孙辈，叙说学科的发展、集体的奋斗、个人的体验，折射出的，是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相关学科 50 年的光辉历程，是新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创建，是政治学从恢复重建到特色自主的

奋斗历程,也是复旦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具体情境。由于学科特性,老教师们的学术心路甚至从一个入微的侧面,反映出党和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以及在全球担当大国责任的伟大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的切入口能作大文章;涓涓细流坚持不懈,就能汇通江海。国务学院老教师口述访谈项目历时三年,项目的意义和成效其实并不限于这本小书。以我的观察,意义在于过程,成效在于教育,主要是三方面。

一是“卓越为公”的国务精神教育。自从1964年毛主席亲笔批示、复旦国政系成立以来,50年几代国务人的奋斗,甘与苦、理想与现实、挫折与成就,熔铸出卓越、为公的情怀和气质。卓越为了为公,为公才能卓越,在访谈老教师的过程中,年轻学生知晓了院史,也在对往事的追忆中理解了奋斗的意义,懂得了卓越为公的真谛。

二是“国箴务实”的治学态度教育。当代中国的国际政治学肇始与本院的历史紧密关联;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的恢复和建设,本院也是重要的策源力量。自那以后,学风嬗变、代际更迭,学院同仁都勉力前行、未曾落伍,到如今拥有两个一级学科的大国务格局。年轻学子走进老教师们的治学心路,不啻于入宝山、游学海,可以大大加深他们对学科发展和学术史的认识,甚至能初步把握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的脉搏,言传身教中对于为国箴言、务求笃实的学风将有切身体会。

三是基于国情、院情的理想信念教育。参与项目的学生基本都出生在1990年代。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风云,也没有体验

过物质匮乏，不仅对党史国史缺乏感性认识，对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切身体会也不深。课堂和书本永远无法替代实践。借助这个项目，他们获得与亲历者交谈交心的机会，因为用心投入而获得认知，是对课堂教学和书本阅读的有效延伸和深切感受。

人的一生，过半百而知天命。但对一个学科、一个学院来说，只要有学脉、有传承、有精神，学术的发展就能蓬勃绵长，真理的追求就能超越个体生命的限制。愿学院的老教授老有所乐，在学术和思索中健康长寿。愿学院的年轻学子不辜负求学光阴，不断体认国务精神、体会治学之道，继承和发扬学院的优良学脉，经过不懈思考和踏实奋斗，臻于真水无香的人生境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分党委书记）

2015年11月1日

于复旦园文科楼

目录

CONTENTS

转入国政建学科,师者仁心树榜样 ——余开祥老师访谈录	1
复旦政治学科发展见证者 ——曹沛霖老师访谈录	19
真情待学生,半生国政缘 ——储复耘老师访谈录	43
源启国政,隽秀人生 ——祝启秀老师访谈录	60
勤于学习,勇挑重担 ——王邦佐老师访谈录	85
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一人 ——童彭庆老师访谈录	108
国政系,我精神的家园 ——孙关宏老师访谈录	128
学史,教书,育国务 ——李孔怀老师访谈录	147

我的国政系岁月	
——张鹭珠老师访谈录	157
师生同舟共济,一心向党为大家	
——潘玲娣老师访谈录	176
记忆依然炽热,师生友情铭记	
——朱桂英老师访谈录	185
我与国政系	
——郭雷老师访谈录	197
五十年热血倾注国务发展	
——倪世雄老师访谈录	212
饱经艰辛历辉煌,治学育人著华章	
——颜声毅老师访谈录	232
复旦情,国务缘	
——郁景祖老师访谈录	252
外语搭桥融筑国务情	
——周理老师访谈录	269

以院系为家,传承热诚美德 ——胡金星老师访谈录	282
笔耕不辍,诲人不倦 ——朱文忠老师访谈录	302
访谈志愿者感言	328
跋: SIRPA, 不会忘记每一位国务人	340

转入国政建学科,师者仁心树榜样

——余开祥老师访谈录*



余开祥,1922年生,浙江江山人。复旦大学马列主义教育系、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创始人之一。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马列主义教育系、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副系主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德法组组长,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曾兼任校教育工会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工会组织部副部长、校图书馆副馆长等职。1988—1989年担任欧洲大学研究院让·莫内项目研

究员。先后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理事,中国西欧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欧洲共同体研究会理事长,中国西欧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会长,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顾问,上海社会科学团体联合会理事、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等学术职务。

余开祥教授为马克思主义在复旦的传播、政治学科在复旦的建立、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5卷)》《西欧各国经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等。在国内外报章杂志上发表论文30多篇。

* 访谈对象:余开祥;访谈人:潘梦琦、王一丹、何思艺;访谈时间:2014年6月14日;访谈地点: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余开祥老师家;整理人:田元源。

年少读书屡受阻，浙渝千里求学苦

我的父亲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先在小学里当体育老师，后来开了个中药铺。他当时不想让我念书，让我在中药铺帮忙，所以我读了初小就辍学了，但我还是依旧很喜欢看书。后来一个亲戚做了小学校长，他让我过去念书，由于我的基础比较好，顺利地读完了高小和初中。初中毕业之后，家里人依旧不希望我再念下去，觉得初中学历就足够了，想让我帮忙减轻家里负担。但是我很强烈的求知渴望，很想再尝试一下。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能争取到奖学金就能给家里减轻很多负担，很幸运的是我被浙江省衢州中学高中部录取了（并取得了奖学金）。当时，中学里有位不错的老师叫王西彦^①，是一位进步作家，常常给我们介绍很多进步思想，我印象深刻。

1941年，我高中毕业时，正是抗战期间，很多衢州人都在逃难。当时我听说在重庆有个国民党办的学校（“中央”政治学校），里面吃饭不用花钱，而且还给生活费，我听着觉得很

^① 王西彦（1914—1999），浙江义乌人。著名作家、文学教授，中共党员，1948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历任福建永安《现代文学》月刊主编，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主要成就在文学评论和散文上，以小说家的创作甘苦丰富他的作家研究，评论鲁迅、茹志鹃作品颇多见道之言；又以小说家的细致、传神笔墨创作散文，长于刻画人物。《第一块基石》和《炼狱中的圣火》分别成为两者的代表作。

好。当时我们全班一百多人都去考了,结果只录取了我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整个浙江省一共只录取了五个人。我们五人联系上后,决定结伴去重庆。

我在去重庆的途中生病了,病情拖到桂林的时候,我开始有点神志不清,感觉头重脚轻,才去看了医生。当时医生开的药太苦,我不吃,病就一直没有好。从贵州到重庆的路很陡,一不小心就会发生意外,现在想起来还胆战心惊。好在过了遵义之后,地势就开始平坦了。

在校苦闷难压抑,触怒教官被退学

我们抵达重庆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才了解到那个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是培养国民党基层干部的。刚进去的时候感觉学校环境不错,福利较好,伙食也不错,但是一段时间下来就感觉压抑得很。因为该校除了每周一上午有“总理纪念周”^①外,每个周末的下午还有生活检讨会。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要举行由军事教官主持的训话。每天除了要军训、扛着枪跑步外,还要受到班级训导员的管头管脚的监视,接受党化教育、法西斯教育那一套。

^①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纪念周”在初期称“总理纪念周”,后期随着孙中山被正式尊为“国父”,遂改称“国父纪念周”。

学校当时有两位中文老师,一位是苏渊雷^①,新中国成立后去了华东师范大学当教授;还有一位是高亨^②,新中国成立后在山东大学做过教授,两位都很不错。我在政治学校念了两年,随着时间的进行,我心里越来越苦闷。有一次我因对军事训练实在厌烦,把枪往地上一扔,结果惹怒了教官,被学校勒令退学。我和另外两位因其他原因受到退学处分的同学去找当时的学校教育长程天放^③说理。程天放觉得勒令退学的理由确实不太符合学校章程的规定,但是要学校收回成命又有失尊严。最后,程天放提出以他私人的名义,把我们推荐到(当时迁到重庆的)其他大学去读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社会教育学院。我们三个人都选择了复旦,但当时的复旦校长章益说复旦不会随便录取靠私人关系推荐上来的学生,一定要通过了考试才能被录取。结果,我因考试成绩很好,得到了时任复旦教务长李炳焕的赏识,邀我到他家去聊天。我说我没有经济来源,跟家里又断了联系,生活很困难。李炳焕说帮我想办法,让我做点翻译,以解决我的困难。

① 苏渊雷(1908—1995),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所编辑、中央政治学校教员、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国文讲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兼第一处长等职。1995年去世前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② 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著名教授,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1926年毕业任教,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等。

③ 程天放(1899—1967),五四运动上海学生会会长,美国伊利诺斯州大学政治学硕士,曾任报纸主编、大学校长。1930年任安徽省代理主席,首任驻德大使(1935—1938),曾任民国时期的宣传部部长、教育部部长。

参与创立民主青年同盟

1943 年秋我转学到了复旦大学经济系,开始了我在复旦的生涯。进校后,我发现复旦有个很大的优点,有很多民主教授,敢于讲话,同学们也都很向往民主,校园里的民主气氛很浓厚。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学校很好,也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教师和同学,并参加一些学生活动。1944 年 12 月,日本人打到了贵州独山,贵阳岌岌可危,重庆也危险了!我和一些同学心系抗战,就开始想办法,碰巧有位同学能弄到枪支,于是我们就真的开始准备去打游击。当然,之后由于抗战局势的变化,打游击也就作罢。

由于学校民主气氛活跃,再加上学校附近有很多学生爱去的茶馆,于是就有地下党员去学校附近的茶馆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学生中间组织了读书会,每周举行报告会,读书会在实际上起着团结和组织进步同学的作用。到了 1944 年年底,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团体。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北碚复旦为中心,我们联合了在北碚地区的大专学校(如朝阳法学院、江苏医学院、音乐学院等),于 1945 年 4 月初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盟”)——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当时领头的是蒋祖培,之后换了一个从西南联大转学到复旦的李炳泉,我们看他像地下党员,于是推他为领导人。李来了之后说,你们搞了政治纲领、经济纲领、社

会纲领,像个政党,但是你们是个青年民主运动的组织,不是政党,可以做学生运动,但不能搞政党活动。于是我们就把那些纲领都取消了,草拟了学生运动的宣言,大家都同意推选李炳泉为主席。

我1943年进入复旦经济系读书,1945年毕业之后就留在经济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初,我在经济系讲政治经济学。当时还有几个教师,像蒋学模、苏绍智,他们讲课效果都很好,反响很热烈,他们后来都留在了经济系。

留校任教后转授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有个老教授上政治大课“马列主义基础”,同学们对他有点意见,因为他一直把马克思叫作“马儿先生”,学生听多了很反感。当时,我是教学科长(1953—1954年),副教务长王中就叫我去接马列主义基础的课,后来就发展成了政治系,这也是我从经济系转到政治系的开始。所以副教务长王中想让我转行,去顶替老教授上那门政治课。其实我心里并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改行了,这一改行啊就上当了(笑)。

我们先是搞“马列主义基础”——就是“联共党史”,当时《毛选》里不是有一篇《改造我们的学习》吗?那时把联共党史捧得很高,说联共党史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但实际上,联共党史是斯大林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没

关系的。但斯大林的思想比列宁还要左,一些有名的人物,一个个都给搞掉了。所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一个“左倾”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后,搞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文化大革命”又让中国的经济停滞了十年——这都是历史教训啊,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话又说回来,1954年7月,从市里调来了一个干部,就是吴常铭,后来他做了教务长和副校长,是国政系的创始人。吴常铭很有名望,为人谦虚,上课也很生动。那两年(1954—1956年)我们是搭档,他是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主任,我是副主任。

1956年,原苏联赫鲁晓夫上台,“马列主义基础”这门课就不开了,教研组也被取消了。后来,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合并成立社会主义教育教研室,吴常铭继续与我搭档。到1960年,社会主义教育教研室改为马列主义教育系。

1962年1月15日,因马列主义教育不是一个学科,吴常铭和我向校领导递交报告,要求把马列主义教育系正式定名为政治学系。当年4月,教育部批复同意,政治学系正式更名,吴常铭和我继续合作,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

政治学系成立时,面临着很大的开课压力,既然是政治学系,就得有政治学的课。系里要我想办法,我就搞了个提纲,我当时搞的头一个是“总论”,下面是“阶级论”和“民族论”,最后一个“国际关系论”。这么一个大綱,还没有写完全,后来我就被调走了。最后没有成品。

1964年,中央开会提出要好好研究外国,并下发了文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批示,就是“要加强对外国的研究”。当时指定中国人民大学搞苏联、东欧研究;北大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复旦搞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当时是以西欧为重点。当时我们在中央开了这个会后,打电话向学校领导汇报,按领导指示西欧作为重点可以,但美国也要作为重点;另外,不光要研究经济,还要研究政治,是两个并重。经中央同意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就在1964年成立了。另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也同时成立。

专搞世经所,笔耕不辍立书说

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时,陈传纲是副校长、党委书记,兼所长;吴常铭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国政系主任,兼副所长;张薰华是经济系主任,兼副所长,曾任市委常委。

当时复旦的党委书记杨西光已经离开复旦调到教委负责教育卫生工作去了。杨西光找我和张薰华去谈话。他说,经研所(经济研究所)陈传纲接着做所长,至于你们两个,张薰华就专搞经济系,经研所的各项日常工作由余开祥负责。

后来因为吴常铭工作很忙,他既做教务长,后来又做副校长,我就把经研所的日常工作都挑起来了。陈传纲、吴常铭都在“文革”中去世了,我就在1979—1983年(11月)这段时间任所长。